

無產者

于 逢





无产者

于 逢

广东人民出版社

无产者

于 逢

*

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广东梅县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9印张 1插页 444,000字

1973年10月第1版 1973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册

书号 10111·1127 定价1.31元

内 容 简 介

本书以党内第十次路线斗争为背景，以南方油城建设为题材，以工业学大庆为主线，描写了七十年代初期我国工业战线上一场尖锐、复杂的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思想斗争。书中深刻批判了林彪那条“政治可以冲击一切”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，形象地揭露了一小撮资产阶级野心家、阴谋家假左真右、拉帮结派的反党活动，热情歌颂了党和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。

封面题字：茅 盾

封面设计：杨讷维

第一 部



—

七十年代第二个春天快要过去，初夏即将到来。金江平原上一直下着连绵细雨，此时也逐渐放晴了。乌云慢慢散开。金色的阳光终于以无比的威力冲破了浓密的云层，洒向大地，照得周围闪闪发亮，鲜艳瑰丽。从炼油厂飘过来的石油味，也变得清淡了，向高空扩散。原野显着一片生机，换上了浓绿的新装。田地都插上秧了，青青葱葱；一片片冬薯地已经犁过。野草漫山遍野铺展开来，在大路旁、田塍上、池塘边，恣意生长，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。石油城里马路中心的花坛上，粉红色的月季花已经开过第二遍了。

城里到处都是木麻黄林。木麻黄排成三列纵队，守卫着一条条笔直的沥青马路。木麻黄连成一道绿色的长城，保护着巨大的炼油厂。木麻黄拥抱着一个个工人村，给人们以抚慰。木麻黄是一种针叶树，一年四季，绿荫婆娑，无论寒来暑往，永不凋萎；不管风吹雨打，照样轻轻摇摆着柔软的尖梢，从容自得；在北风怒号、草木零落的日子里，依然生气勃勃，坚守自己的岗位。而当现在暮春将尽、万物争妍的时候，它又并不特别显眼，永远保持自己的朴素本色。

罗冈村是石油城里最老的工人村之一，座落在一带起伏不平的山坡上。周围的木麻黄格外高，绿荫也格外浓。环绕着池塘，

展开了一大片平房和一幢幢两层、三层的楼房。这里那里墙上，还留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写的一些大标语，很是显眼。在最早的平房区西南端，靠近池塘，在一列参天的木麻黄的荫蔽下，住着一户姓周的人家。丈夫周毅华，今年三十八岁，河南人，是建筑工程公司党委的常委兼安装第一队的党支部书记。妻子贺淑梅，三十四岁，也是河南人，参加街道的缝纫合作组，回家就是烧饭洗衣服。大女儿周燕，十四岁了，在市里中学念初中；小儿子周川，不到七岁，还在幼儿园。

傍晚时分，贺淑梅在等着丈夫回来吃饭，心里有点生气，也很着急。丈夫这次去参加学习班，跟平常不大一样，时间长，纪律严，快一个月了，只回来过两次，看了看孩子就匆匆忙忙走了，脸色严肃，话也不多说。现在左等也不见他，右等也不见他，贺淑梅就不等了，亮了电灯，自己和孩子们吃了饭，开始收拾碗筷。这时候，从门外气喘吁吁地走进一个人来。贺淑梅认得他是安装一队的起重班班长柯金水。年纪约莫四十岁，体格健壮，方脸浓眉，穿一身油污的工作服，戴一顶安全帽，显然是从工地来的。他是金江市本地人，说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。贺淑梅听不大懂，却也能猜出那主要的意思。柯金水来找支部书记周毅华，是要解决运回一台十五吨吊车的问题。他们习惯把起重机叫“吊车”，或者简单地叫做“吊”；十五吨是指吊装能力。他说，有一台十五吨吊搁在什么地方，过不了桥，开不回来，搁了一天多了；目前工地上安装一队正在和安装二队展开劳动竞赛，没有这台吊车就会影响施工进度，给拉下来，因此非立刻解决不可。他问，周支书去东风村集中学习，听说今天已经结束，他到底回来了没有。

“还没有呀！”贺淑梅两手一摊，笑了。“我也是等着他回来

吃饭呢。到现在还不见他的影子！同他一起去学习的人五点钟都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。你是刚从催化安装施工现场来的吧？”

“不，我是去运吊车的。”柯金水失望地搔了搔脖子。

“那你就回现场找找他看，……”

柯金水没有听完贺淑梅的话，道歉了一声，骑上自行车，急忙忙地走了。贺淑梅手里拿着抹布，站在门前，目送他远去。不料刚一转背，又来了一个人：身材高大、两颊胖呼呼的，年纪不过二十岁，没有坐自行车，是徒步走来的。他近日来过多次了，叫做梁根生。也说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，却比较流利好懂。他来找周支书，说来说去就是那么几句话：他到起重班当学徒工不合适呀，要求调换工种呀，显得愁容不展，满怀心事，一脸憋气。

“快一个月了，他怎么还不回来？”他瓮声瓮气地问。话都說完了，却低着眉毛，还是坐着不动。

“我也不知道呀！”贺淑梅只好让他坐着，自己蹲在走廊上开始洗碗筷。

“这批学徒工很多嘛！谁都没有分配到起重班，为什么偏要分配我？”他提出质问，显然把贺淑梅当成周支书本人了。

贺淑梅笑了起来，象哄孩子似地安慰他说：“这个我怎么知道呢！组织上分配的事我不懂。等老周回来，我告诉他就是了。好吗？”

梁根生没有答话，讪讪地走了。

周毅华的事真多呀，大家都要来找他。多少年来他都是忙得团团转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，他是一个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成员，整天奔走串连，开会讨论，写大字报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执行人。后来全市革命组织大联合了，各级领导成立了革命委

员会，他转到基建队，参加了一个大会战又一个大会战，没有停过。去年秋天，炼油厂里又要建两个装置，一个叫蒸馏，一个叫催化裂化。催化裂化装置的安装施工，主要由安装一队负责，他就搬到工地去住了。只有星期天在家休息，却也不得安生，不是这个人来寻，就是那个人来找。他们谈的都是工地上的事，贺淑梅听着弄不明白，只觉那里一派热火朝天，万马奔腾，叫她内心向往不已。她想，一个家，一个缝纫组，一个工人村，是多么小呀！很想出去见见世面，但自己却不是工人，连个临时工也不是，怎么去呢？而且学习又少，什么都不懂。她这样想着，就有点埋怨自己的丈夫了，埋怨他不关心家里，不关心她，也不了解她。可是见他一天到晚在忙，人也瘦了，胃病又象要发作，过去受伤的左腿又显得不大灵活，她又觉得自己错怪他了。

贺淑梅等到九点多钟；小川不知什么时候溜到谁家玩要去了；小燕已经坐在桌前开始做功课。她于是到左邻右舍去串门。她想，在这附近和周毅华一同去学习的也有好几个人，不如去打听一下吧。其中一个较熟的是徐维新，也是工程公司党委的常委，就住在池塘对面那幢三层楼房里。他的妻子凌凤霞，和她很要好，经常来往，文化大革命中几乎天天见面，互通消息，交换意见，是很投契的。这个广州妇女比贺淑梅小三岁，贺淑梅是看着她搬来罗冈村养下女孩的。她是安装一队的电焊工，常有事来找周毅华，两个人就熟起来。她喜欢贺淑梅待人温厚，贺淑梅喜欢她泼辣；后来听说她解放前是个孤儿院里的孤儿，自小无父无母，就对她有着一份深切的同情。但贺淑梅却不大喜欢她的丈夫，总觉得这个人对人有点敷衍冷淡，说话也装腔作势。不过她又时常反省：看人不要凭印象，要看本质啊！……现在，她一边沉思，一边绕过池塘，向着那幢三层楼房慢慢走去。

徐维新、凌凤霞和他们的小女孩都在家里。他们住的是二楼朝东南的大小两个房间。大房间做卧室，小房间做客厅，都安上了一百瓦的大灯泡，照得周围亮堂堂地。客厅正墙当中用相架挂了个毛主席像，周围贴了红色的“语录”纸，以及革命现代京剧的图片。书架上排列着红宝书。桌子上立着一个洋娃娃玩具，桌面摆着一块玻璃板，玻璃板下压着他们俩的结婚照片。这真是一个充满生气的幸福家庭啊！的确，自从徐维新去年提升为工程公司党委的常委，他们家就从楼下搬到二楼上来，住的房间也一变为二，而且朝南。一些家具是新买的，客厅的布置充满了政治气氛。现在，这个家的主人徐维新穿着一套干干净净、平平整整的工作服坐在藤椅里，把女孩放在膝上玩着。他年纪三十四五岁，长脸疏眉小眼睛，下唇微翘，头发剪短，样子看起来很英俊。凌凤霞则把日间的工作服换了，穿一条蓝斜布裤，披一件灰的确良外衣，把衬衣的白领子翻出来。她坐在旁边拿着梳子正在替女孩梳小辫子。见有人来，就不好意思地站起来，仿佛给发现了秘密似的，脸上显出羞涩的神色，但掩盖不住眼里的快乐光芒。

“贺大姐！坐，坐。”她连忙推过一张竹椅来，又去倒茶。她长挑身材，脚步轻快，摆动着两条长辫子，还象做姑娘时候那样。

“老徐同志晚上不出去走走吗？”贺淑梅先向徐维新打招呼。
“你们今天学习结束了？”

“唔，结束了。”徐维新说话一向不冷不热。

“周支书不也回来了吗？”凌凤霞向贺淑梅微笑。

“还没有。也不知他到哪里瞎跑去了。”

“啊，不错。”徐维新说，“他是回催化现场去了。听说出了点小事故，他就急急赶回去了。”

“现场上出了事故？……”贺淑梅心里不安起来。

“不怕的，贺大姐！”凌凤霞安慰她。“这算什么事故？只是水管焊接不好，试压时候漏点水罢了。返工就行。老周同志看了就会回来的。小霞霞，你为什么不叫阿姨？来，叫阿姨！”

“阿姨！”小霞的声音清脆得象小鸟。

“乖！”贺淑梅故意问：“小霞几岁了？”

“告诉阿姨，你几岁了？”

小霞不肯说，咬着嘴唇，伸出了三个指头。

“来，小霞唱个歌给阿姨听！小霞会不会唱？”

“我唱歌歌。”小霞翻身跳到地上来。

这是个胖娃娃，梳着两根翘起来的小辫子。辫梢上扎着两只红蝴蝶。红喷喷的圆脸孔，乌黑发亮的两颗眼珠。她看着贺阿姨，咬着小嘴唇，要笑非笑，右颊上显出了个深深的酒窝，很象她的妈妈。经妈妈的一再鼓励，她于是正正经经站着，好象在幼儿园那样，摆好姿势，就大声唱起来。亏她记得住，咿咿呀呀地都唱全了。这支歌对她来说，有些词儿还约略懂得，有些只不过是很好听的声音罢了。但她感到这支歌是很亲切又很严肃的，于是一本正经地唱着，有几回想笑又不敢笑。唱的最后一句“都有一颗红亮的心”，就举起右手在头上，伸出了一根食指。她一唱完，忽然害羞了，躲到妈妈的怀里，不肯转过脸来。三个大人都笑了。凌凤霞心里充满了欢乐。

大家逗着小霞说笑了一会。妈妈又要她跳个舞给贺阿姨看。她怎么也不肯，反而要到街上去玩。凌凤霞只好叫徐维新带她出去。贺淑梅也起身告辞，凌凤霞却留住她：

“贺姐，你再坐一会，替我把辫子剪短。辫子一长，讨厌死了！”凌凤霞蹙起眉头。“留着长辫子干活很不方便，要盘起来，戴

上安全帽，麻烦透了。我今天钻进油塔里焊塔盘，焊着焊着，辫子就掉下来。我早就想把它剪短了。”凌凤霞一边说，一边走动，去找剪子，搬椅子。

“你那老徐答应吗？”贺淑梅口里含笑。

“答应是答应了，可是……”凌凤霞停了停，转口说：“我才不管他，我要剪就剪呗！头发是我的，又不是他的。”

屋子里只有两个妇女，空气活泼了，说话也随便了。凌凤霞坐在镜子前，贺淑梅站在她身后，拿起剪子。她们比划着，研究要剪多短，怎么剪，又用塑料带子把辫子上截扎了起来。她们对着镜子，一边剪，一边说话，又互相看看。镜子里照出凌凤霞那微黑的俊脸孔，嘴边带着笑意，一双大眼睛乌溜溜的，喜欢侧着头看人，带着小猫样的神气：大胆、好奇、又有点野性。她两颊泛红，容光焕发，显然自觉生活在快乐和幸福中。贺淑梅呢，个子小，身体也不健壮，梳着短发，圆脸孔，细眼睛，神态温顺。她站在凌凤霞后面，就象个大姐姐。凌凤霞辫子剪短了，一摇头，左右晃动，就象个小姑娘。贺淑梅情不自禁地说：

“小凌，你瞧你现在变成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！”

“哪里！老了！”凌凤霞把贺淑梅一推，一面收拾剪子等物，回避着对方的好奇眼光。

“你算什么老！年纪轻，身体又好，当上了电焊技工，能为国家多作贡献。我才老呢，什么都不懂，只会围着锅头打转转呀！”贺淑梅叹息了一声。

“哪里的话！你参加缝纫组，又做街道工作，难道这不是为人民服务？”

“唉，这就差得远了！”

“那么，为什么不去当临时工？土建队现在还很缺人，不需要

什么技术的。”

“可是老头不让呀。”

“老周同志不让吗?”凌凤霞笑起来。“嘿，想不到他这样落后。我见到他，可要给他一顿批评!”

“对着哪!”贺淑梅也笑了。“小凌，这件事你可要帮一帮我的忙。我提了好几回，他都不让，总是说，搞安装我没有技术，不行；搞土建要拚力气，又怕我吃不消。左一个怕，右一个怕，就是不让我去。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，全市贴满大字报，打倒刘少奇，批判走资派，工地上火辣辣的，页岩干馏炉呀，延迟焦化装置呀，一部部建起来；学‘毛著’呀，学大庆呀，学‘铁人’呀，闹得热火朝天。大家都进步了，我呢，却给拉在后面。小凌，你说我的心有多急啊！老徐好，他理论高，能帮助你。可是我那老头呀，一天到头就是忙，回得家来谈不上两句话就跑了。快四十岁的人了，还是咋呼呼的。老徐比他年青，可比他老成多了。老徐对你又好，又能帮助你！”

“不不不！”凌凤霞连连摆手抿着嘴说，“你别替他吹了！他这个人可主观哩！我们常闹点小别扭，这是你不知道的了。”

贺淑梅趁势说：“你替我问问老徐，土建队是不是真的要人？”

凌凤霞想了一想，说：“听说还要招一批家属工。现在炼油厂里工地上两个装置同时搞，安装一队和二队正在展开竞赛。土建忙得不可开交，原来就不够人，听说最近还要派人去市里支援盖楼房，……”

贺淑梅连忙说：“市里我不去；要去就去工地。”

凌凤霞说：“老周不也是公司党委的常委吗？你好象什么都不知道似的。”

贺淑梅生起气来：“他回来就是不作声嘛！怕我要去。说真

的，你替我问老徐好不好？”

“老周不同意呢？”

“这回我拿定主意了，要跟他狠狠吵一架！”贺淑梅把手一摆，又象认真，又象说笑。她忽然凑到凌凤霞的耳边悄悄说：“你知道，他是最怕吵架的。”

两个妇女于是一齐笑了起来。

二

周毅华骑着自行车带了铺盖回到催化现场，觉得周围一切既熟悉而又生疏。

队部办公室里一切依旧。当中摆着几张办公桌子，靠墙放着几副板床，角落上堆着油污的工具，发出油泥的气味。电焊条烘柜亮着绿灯，大幅的施工进度表贴在墙上。窗外呢，照耀着小太阳灯的青光，钢铁在震响，电焊机在嗡嗡地吟哦，混凝土搅拌机在咯啦啦地叫闹。他离开的时候，那反应器和再生器的框架四周，刚破土动工，现在堆起了黄土，混凝土方柱一根根筑起来都有十米高了。土建工人正在框架周围的脚手架爬上爬下，进行紧张的战斗。从幽静的东风村回到这沸腾的工地来，周毅华觉得一切完全依旧而又十分新鲜。

在学习班一个月，他在思想上经历了一场大震动。

这次学习班在市党校办。党校设在东风村，远离市区，隔着小金江，淡淡地可以看到市中心的一些高层建筑物和炼油厂的一根根高烟囱。党校周围环绕着木麻黄、竹林、石栗、金凤凰，泛

着植物和泥土的芬芳。面前展开了一望无际的绿色田野。更往南，就是浩瀚的南海了；虽然看不见，但从那里一天到晚吹来劲烈的、清新的海风，叫人心旷神怡。晚间，青蛙到处呱呱地叫，此唱彼和，简直带点田园风味。环境是这样安静、优美，但斗争却是尖锐的、激烈的。

这次学习班的内容是：“批陈整风”，重点“批陈”。

“陈”是谁？就是陈伯达。原来这个国民党反共分子、托派、叛徒、特务、修正主义分子，在去年八月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，伙同几个党羽起哄，妄图搞反革命政变。但立刻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所觉察而被完全粉碎了。

周毅华，受到党的多年教育培养，经历过多次革命斗争的实践，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，当然知道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是又漫长、又曲折的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永无止息；但他怎么也想不到，我们党的最高领导机构竟给钻进了这样一个凶恶的敌人来。真是一件危险的事！他起先听到传达，读到文件，十分惊讶，接着从惊讶转为愤慨。以后对照认真学习毛主席有关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，大会小会揭露阶级敌人的罪恶阴谋，批判陈伯达的修正主义谬论，觉得自己眼睛明亮起来，心里也踏实多了。

现在他回到队部办公室坐下来，情绪还很不平静；然而日常事务立刻汹涌而至，使他很快回到了熟悉的生活轨道上。——施工员吴伯泉向他汇报了工作。一些班长、组长见支部书记回来了，都先后跑到办公室来，周围顿时热气腾腾。这个问：“支书你是刚回来的吗？”那个问：“不会再走了吧？吃了饭没有？”一个年青铆工叫小崔的，仔细端详他的脸孔，笑着说：“你去东风村住了一个月，好舒服啊！瞧，胖起来了！”

大家都笑了。

周毅华也笑了，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的腮帮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没有胖，还是那个样。”

“还说不胖？”崔向东转向大家：“我有充分的根据证明他是胖了。大家不信，来摸摸这里！”说着，就伸手要捏周毅华的肩膀。冷不防给周毅华的拳头往腰部轻轻一捅，酸得他连忙缩手，倒退了两步。

众人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活该，活该！”一个老管工连连点头说，“年轻小伙子想要欺负老兵，好大的胆子！”

众人又笑了。

周毅华把铺盖打开，开始铺床，一边笑问道：“怎么样？现场情况好吗？和二队搞劳动竞赛，我们还撵得上吧？”

“还说搞劳动竞赛！连水管都焊不好，一试压，许多焊接口都漏了，老周！你说还搞什么竞赛呀？”老管工龙亚照抢先告状，用手比划着，帮助语气。他已经六十二岁了，人还硬朗，动作敏捷，一头短短疏疏的白发，脸上刻着几条深深的皱纹。说一口地道的广州话，也学说普通话，不伦不类，到现在还时常说溜了嘴，管钢丝绳叫“威也”，管扳手叫“士巴拿”，管棉纱叫“威示”。大家于是戏称他做“广东佬”。

周毅华还能听懂他的话，于是问：“是学徒工焊的吗？”

“什么学徒工！一个个都是老焊工！”龙亚照生起气来。“我说他们就是不负责任！不顾工程质量！基建是百年大计呀！怎么能这样乱干一气，嘻！”

“来来来，老师傅！我们一起去看！”周毅华拍拍老管工的肩头。